

从文本到课堂：国际中文教材性别话语与教师调解机制研究

谢思宇 樊士谦

吉林外国语大学

摘要：教材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其内置的性别表征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全球中文学习者的价值判断。研究发现，《发展汉语》教材在角色数量、职业声望、社会空间等维度存在性别失衡现象。面对该现象，教师展现出忽略、补充/修正以及批判性讨论三类主要调解机制，其选择受多因素制约。因此，教材修订应致力于构建性别平等视角；教师发展需纳入性别文化意识培训，以共同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向更包容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教材；性别表征；教师调解

DOI：10.65976/3080-0374.2026.05.021

引言

全球教育领域日益强调性别平等，语言教材作为文化载体，深刻影响着学习者的价值观与社会化进程。国际中文教育近年来快速发展，但其教材内容是否与现代性别观念同步，成为亟待探讨的问题。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教材文本的批判性分析，缺乏对教学实践环节的关注。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缺口，探索国际中文教师如何调解教材中的性别议题。

一、研究现状

既有研究普遍指出，语言教材中的性别话语存在结构性失衡与传统性别角色固化的问题。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材编写领域逐步引入性别平等理念，并尝试通过使用“中性语言”或增加女性形象来弱化性别偏见，但研究表明，这类调整在话语结构层面成效有限（Johansson,S.,&Malmsj Bachelder,K.,2009）。Sadker与Zittleman（2007）进一步指出，部分教材通过形式层面的“可见平衡”营造性别平等的假象，却未能改变文本叙事和角色配置中的深层不对称性。崔冲、吴黛舒（2019）指出，教材中蕴含的主流性别文化通过教材的形象性、情感性与观念性特征影响学习者，为揭示国际中文教材中性别表征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性别社会化理论指出，教材中所承载的性别文化信息在制度化教学过程中被反复呈现并内化，进而影响学习者的性别认同、角色期待与自我价值判断（庞婧、赵明玉，2025）。对国际中文教材而言，文本并非性别话语建构的终点，其意义往往在课堂互动中被重新阐释。Sunderland（1998）指出，教师在教材性别话语的理解、选择与呈现过程中具有重要调解作用。因此，

有必要从文本到课堂这一连续体出发，考察国际中文教学中性别话语的课堂调解机制，以更全面地理解教材性别话语的实际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混合方法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解释性混合方法，即先进行定量为主的教材内容分析，再开展定性的教师深度访谈。这一设计基于本研究的两大核心问题：客观揭示教材文本中性别表征的“是什么”；深入理解教师如何解读和处理这些表征的“为什么”与“怎么样”。采用混合方法，能使教材分析的客观发现为访谈提供坚实的切入点与讨论基础，而访谈的深度洞察则能有效解释和补充量化结果，从而全面、深入地回答本研究提出的问题。

（二）教材内容分析

本研究选取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发展汉语》综合教材作为分析对象，具体包括初级综合（I、II），中级综合（I）以及高级综合（I），共4册。该系列教材是国际中文教育领域权威性高、使用范围广泛的主流教材，对其进行分析能够较好地反映国际中文教材在性别表征方面的普遍状况。选择初、中、高三个级别，旨在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文本系统。

基于文献梳理与教材内容，本研究建立了包含五个维度的分析类目，对教材课文中所有出现的人物描述或对话进行编码。具体编码方案如表1所示。

（三）教师访谈研究

访谈对象采用目的性抽样，招募了6位拥有《发展汉语》教学经验的国际中文教师。访谈为半结构化，

作者简介：谢思宇（200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

樊士谦（2002—），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表 1 具体编码

分析维度	编码说明
能见度 / 数量	统计男女角色出现频次
职业声望	记录角色职业, 按声望等级编码
社会空间	区分公域与私域, 考察活动空间的性别化
话语权	判断在对话中行为, 分析互动中的权力关系
形容词	收集并归类用于描述男女人物的形容词, 分析其侧重

围绕教师对性别表征的认知、课堂中的调解策略、自身认同等维度展开。

三、《发展汉语》中的性别世界

(一) 男女角色能见度差异

人物的“出厂设置”不平衡。在所有登场人物中, 男性角色占比 56.5% (n=116), 女性角色仅占 36.1% (n=72), 其余为混合 / 不明。男性角色在教材中的数量和出场率显著高于女性角色, 这种差异构成了“男多女少”的叙事格局。在初级综合第一册的 7 名主角中, 男性占 5 名, 女性仅 2 名。教材从开篇即确立了男性作为主要叙事者的地位, 女性多作为配角或陪伴者出现。

(二) 职业声望的性别分布

结果显示, 性别与职业声望之间存在极显著关联。这种差异绝非偶然, 而是教材编写中的系统性偏差。女性大量集中在无业 / 主妇 (等级 4) 和 中层 (等级 2) 职业。尤其是等级 4 中, 女性占比 16 人, 男性仅 3 人 (表 2)。从职业类型来看, 男性职业集中于律师、职员、专家甚至罪犯。职业类型大概围绕法律、权威、体力。而女性职业集中于老师、护士、主妇, 围绕照料、教育、辅助构建职业形象。即便女性 (朱云妈妈) 从事医生这类较高声望的职业, 其形象与同家庭的男性 (父亲为律师) 相比, 仍被赋予了照料属性。但在中级第一

册第 15 课中,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年轻女性。她帮助别人实现梦想, 在城市屋顶开辟菜园, 利用软件和技术来管理农业。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反例。女性不再是室内的、被动的, 而是走上屋顶、运用技术来解决问题。

(三) 公域与私域的性别占位

数据表明, 性别与社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形成了“男主外, 女主内”的格局。男性角色活跃在职场、社会等公共领域, 女性出现在私人领域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以上。在《初级汉语》第一册第 17 课中, 李老师核心行为是“去超市买酒”, 回来后与学生谈笑风生, 并在对话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他的爱人虽然被提及“做了很多好吃的菜”“教我们包饺子”, 但在整个场景中处于失语状态。但在第二册中, 李老师亲自包了饺子送给学生。作为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男性, 李老师从事了“照料”行为。这打破了君子远庖厨的传统男性刻板印象, 展示了男性的温柔与关怀特质。这证明教材并非全盘刻板, 而是存在积极的表征。

(四) 话语行为中的性别差异

这部分的统计结果比较微妙, 虽然未达统计学显著, 但趋势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教材为了教学需要 (A 问 B 答), 强制平衡了男女的对话轮次, 但具体的轮次比例仍能反映出问题。在语轮交互方面, 男性作为

表 2 职业声望的性别分布

变量	等级	性别			χ^2	p
		男	女	其他		
职业声望	0	7(6.03%)	7(9.72%)	10(58.82%)	71.823	< 0.001
	1	15(12.93%)	5(6.94%)	4(23.53%)		
	2	19(16.38%)	13(18.06%)	0(0.00%)		
	3	7(6.03%)	1(1.39%)	1(5.88%)		
	4	3(2.59%)	16(22.22%)	2(11.76%)		
	5	65(56.03%)	30(41.67%)	0(0.00%)		

表 3

变量	分类	性别			χ^2	p
		男	女	其他		
社会空间	公共	97(83.62%)	43(59.72%)	9(52.94%)	16.418	< 0.001
	私人	19(16.38%)	29(40.28%)	8(47.06%)		

话题发起者的比例(60.9%)远高于女性(43.4%)。男性倾向于提问、建议、解释,女性倾向于回应、附和、感叹。在初级综合第一册中,社交活动的发起者均为男性。第8课中马丁提议:“我们请你吃饭,怎么样?”第10课中崔浩询问大家累不累,并建议:“我们去那儿喝一点儿茶”。而在这类对话中,林娜(女)的主要话语是“太好了”“好啊”等简短回应性表达。

(五) 形容词的二元对立

用于描述男性的词汇多指向智力与成就,如“知识丰富”“富有”“诚实”。描述女性的词汇高度集中在外貌和性格,如“漂亮”(出现频次最高)“好看”“温柔”。且男性的形容词分类形象相对丰富,女性的形容词世界较为匮乏。在高级综合第12课文《孤独的晚餐》中,描绘了索重阳作为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男性。他下班后翻遍通讯录,试图找人吃饭,却发现大家都很忙,最后只能独自吃饭的故事。这篇课文非常细腻地描写了现代都市人的孤独。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深刻的存在主义危机被赋予了一个男性角色。相比之下,女性角色的内心描写往往集中在情感纠葛或家庭琐事上。

(六) 性别表征的跨文化图像

教材在塑造外国角色时,呈现出明显的文化本质主义倾向,即将其性别表征与国籍刻板印象叠加。在男性角色方面,欧美男性马丁被塑造为技术掌握者和活动组织者,而日韩男性则更侧重于知识渊博和孝顺的模范生形象。相较之下,外国女性角色的叙事功能相对单一,往往被置于文化适应与审美凝视的双重框架之中。初级综合第二册第5课中“洋媳妇”黛比虽然来自西方,但叙事重点在于她如何适应中国家庭规则(吃油条、被公婆照顾)。林娜(法国)作为矛盾的综合体,在形象塑造上有所突破但又略显保守。她是主要角色中唯一在结账场合表现出主动性和管理能力的女性(主动提议AA制)。同时,她又是电视迷,关注穿着。这表明其形象是本土传统性别观念与西方女性刻板印象的混合体。

四、教师的洞察与调解

(一) 教师认知层面:从敏锐洞察到无意识忽略

不同教师对教材性别表征的认知呈现出差异。部分教师能清晰意识到教材中男女角色数量差异、分工差异等问题,并归因于教材编写的时代背景与社会观念。教师A提到:“比如说像这个教材里面男女角色的塑造,它主要反映了这种传统偏保守的性别分工,因为它也延续了过去社会里面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惯性认知。”同时,另一部分教师对该问题呈现出低

敏感态度。这部分教师更倾向于把教材视为传授语言知识的工具。他们认为应重点关注本堂课教授的语法点,而教材中的角色性别呈现与语言教学目标之间关联不大。

(二) 教师行为层面:3种教师调解机制

在教材进入课堂实施阶段后,教师对教材性别话语的处理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基于访谈资料,本文归纳出3种具有代表性的教师调解机制。

(1) 忽略。对于部分教师而言,课时压力、教学进度以及学生对该问题的敏感度等都将成限制其在课堂上对于教材内容的干预。面对这部分所产生的阻力,教师们会将性别议题视作非核心语言教学内容,从而使用忽略策略。教师B解释:“如果这个不是很重要的话,那应该会跳过吧。”

(2) 补充/修正。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教师在不改变教材原有布局下,通常会使用提出反例、角色互换或扩展材料等方式进行补充和修正。这种“微调式”调解是实践中最为常见且操作性较强的方式。不过正如教师D所言:“都说要修改,教师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语言学知识对这么深刻的问题(性别)进行剖析,让课堂效果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就很值得思考。

(3) 批判性讨论。在访谈中,教师C表示,针对高级汉语水平的学生,可以把教材内容当作课堂讨论的素材,通过向学生提问“你们觉得这个课文里面的角色和现实生活是一样的吗?”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教师们将教材性别表征本身转化为课堂讨论对象,引导学生比较教材呈现与现实社会间的差异。该机制通过削弱教材话语的权威性,能够促进学习者形成批判性文化意识,是最优但也最为受限的一种方式。

(三) 课堂差异:调解中的制约与挑战

作为语言教师,在课堂上讨论性别这种相对敏感的文化议题,本身就面对多重制约与挑战。教师E指出,在开展相关讨论时,需要考虑学生是否对相关话题感兴趣,以及此类讨论是否会被学生认为占用课堂时间等问题。此外,面对文化背景多元的学生,要考虑到相关话题触及其文化禁忌的可能。面对课业压力以及权威教材的选择上,教师是否有足够的权利对内容进行调整,这也是实际教学中可能出现的挑战。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混合研究的方法,系统考察了国际中文教材的性别表征情况以及教师在其中的调解。对教材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发现,教材中存在性别失衡的现象。男性角色在数量,职业声望以及公共领域等维度

占据主导地位。女性角色则多被赋予辅助、陪伴者等标签。面对不平衡,教师调解机制主要分为3种模式,即忽略、补充/修正以及批判性讨论。但教师也提及自身调解行为受制于多重因素。研究表明,教材的性别表征并非直接传递至课堂,而是在与教师的互动中被重新设计和改写。因此,教材修订应致力于构建平等视角,也应为教师提供有关性别文化意识的素质培训,以共同推动国际中文教育课堂向更包容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崔冲,吴黛舒.教材中性别角色的实证分析:以部编本语文教材为例[J].全球教育展望,2019,48(4):105-118.
- [2] 庞婧,赵明玉.社会性别理论视域下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女性形象[C]//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当代教育评论——第十七辑.扬州大学教育学院,2025:199-205.
- [3] Johansson,S.,&MalmşjöBachelder,K.(2009).Gender bias in EFL textbook dialogues.
- [4] Sadker,D.M.,&Zittleman,K.(2007).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detecting and correcting gender bias in your classroom. Gender in the classroom:Foundations,skills,methods,and strategies across the curriculum,259-275.
- [5] Sunderland,J.Girls being quiet: a problem for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s?[J].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1998, 2(1):48-82.